

# 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 台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的政治認同與實踐困境<sup>i</sup>

林瓊華<sup>ii</sup>

## 摘要

作者除指出陳芳明所形塑與強調的，台獨形象的謝雪紅，不僅建立在扭曲史料與曲解史實上；深受其影響而誤解謝氏的台灣讀者，其實也反映了法國史學家布洛克（Marc Bloch）所謂的「集體意識之鏡」——而這份誤解之所以生成，正因呼應了大眾的偏見，亦即對台灣前途的主觀願望。本文也從歷史脈絡回顧歷經三重國族經驗的台灣社會主義者謝雪紅，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中，關於「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的政治理念，探究謝雪紅在不同歷史階段有所調整改變的政治認同，而這些在相應的客觀環境中所改變的不同認同，有其現實遭逢的實踐困境與歷史因素，但最終流亡中國後從未改變的，是她堅持台灣自治路線的社會主義信念。

**關鍵字：**謝雪紅，社會主義者，左獨，左統，民主自治

---

<sup>i</sup> 感謝吳叡人教授與匿名審查人對本文的評論與鼓勵，作者特致謝忱。

<sup>ii</sup>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語言與人文研究所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 **Left Independence, Left Unification, and Democratic**

### **Autonomy :**

##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Practical Dilemma of**

### **Socialist Xie Xuehong**

### **Lin, Chung-Hua**

#### **Abstract**

Xie Xuehong as an advocator of Taiwan Independence has erroneously been rooted in people's mind. Such a misconception resulted from Fang-Ming Chen's biased characterization, built upon distorted historical material.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hen's superimposition, Taiwanese readers unknowingly anticipate Taiwan's future by identifying with Xie's trajectory, a situation manifested in Marc Bloch's mirror of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socialist Xie Xuehong, with threefold national identity, experienced "left independence," "left unification," and "democratic autonomy" in different milieus. The fact that Xie modified her political identity exemplifies how a socialist attempted to survive under constantly changing circumstances. Since her exile in China, what did not change is her insistence upon Taiwan's autonomy.

**Keywords :** Xie Xuehong, Socialist, Left Independence, Left Unification, Democratic Autonomy

進一步而言，除非誤解是與大眾的偏見相配合，否則就不會傳開，不會有生命。誤解因此是一面鏡子，集體意識從中凝望自己的樣貌。

——Marc Bloch<sup>1</sup>

究明事實是一種正義。

——林炳炎<sup>2</sup>

## 一、前言：從「集體意識之鏡」談起

謝雪紅的歷史在台灣社會的重返，應以陳芳明教授的著作《謝雪紅評傳》（後稱《評傳》）於1991年（前衛版初版）為起點。這個起步，對先前猶如荒漠般的台灣左翼殖民史研究，是重要的開端。關於這冊著作的貢獻與爭議，筆者曾於2010年發表過長文書評〈流亡、自治與民主：試論陳芳明著作《謝雪紅評傳》之貢獻及其爭議〉<sup>3</sup>，拙作中指出該書的兩大爭議，一是關於史料的引用與詮釋問題，再者是有關陳芳明對謝雪紅的台獨主義者形象的塑造。而這兩個問題其實互為表裡，息息相關；史料的不當詮釋，自然影響對傳主政治立場的判斷與認知。由於作者主觀上刻意切斷謝雪紅與中共的關係，在史料應用上更犯了史家求真原則的大忌，例如在1928年台共在上海的建黨大會上的出席人員名單上，改寫了《警察沿革誌》的原始史料，闕漏了隸屬中共的台灣人翁澤生一名，並依此做了台共與中共疏離的詮釋。<sup>4</sup>而就此釋史方式，作者在書中過多

<sup>1</sup> Marc Bloch (1886-1944),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A. Colin, 1949, p. 61. 此處筆者依法文原作翻譯，但參考周婉窈教授譯自英文的版本：布洛克著，《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頁103。

<sup>2</sup> 林炳炎先生（台共創建者林木順的親侄與繼子）以此言做為〈自序〉一文的標題，見《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創立》（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資料中心，2013年）。

<sup>3</sup> 參林瓊華，〈流亡、自治與民主：試論陳芳明著作《謝雪紅評傳》之貢獻及其爭議〉，《台灣風物》第六十卷第二期，2010年6月。

<sup>4</sup> 依《警察沿革誌》日文版（頁590）記載的九名出席者為中共代表彭榮，朝鮮共產主義者代表呂運亨，以及林木順、翁澤生、林日高、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謝雪紅（謝雪紅在自傳《我的半生記》中則多了「謝玉鵬」一人共十人）。陳芳明則在2009年該書新版（麥田版，頁62）中重複舊版（頁90）的錯誤，援引《警察沿革誌》所載為九名，實際上未將翁澤生列入，並依此評斷「至於已經加入中共的翁澤生，卻反而沒有參加大會」、「中共在其黨史上能夠勇於

基於個人主觀心理臆測或失真的推論，謝雪紅被突出其台獨主義者的論述發展方向，於焉完成，多年來對台灣社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sup>5</sup>

而對於謝雪紅被如此定音歸放為「獨」，即使先不探究其被認知的定義、內涵，乃至屬實與否，眼目前台灣社會面臨的現況是：歷經長期戒嚴的反共體制，以及中共／中國對台文攻武嚇，復加統戰目的鮮明的懷柔策略，從未停歇的現狀，多數具台灣主體意識的住民，對中國當局多半反感並懷著戒心。也因此一個終生抵抗強權，乃至與中共在政治立場上產生嚴重扞格，重新浮現島嶼視野的台灣女革命者形像，是備受突破戒嚴後的台灣社會歡迎的。所以不論左獨、右獨，一部能激勵台灣獨立自主勇氣的歷史女英雄敘事，最符合眼前所需。

但事實上，歷經三重國族體制的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謝雪紅，1970 年在北京臨終前的三點遺言中，第一條正是「我不是右派」——因為被掛在身上的「右派份子」罪名依然未被平反；第二條是「我仍然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是她至死對自己一生最在意的自我身分認同。但關於這點，陳芳明認為這是她「仍然必須向共產黨交心」，<sup>6</sup>而最後一條「我一生也犯過錯誤」，也被認為是臨終的她「仍然必須向後世承認她的錯誤」。<sup>7</sup>或許正因為謝雪紅彌留前所立的遺囑，有中共軍代表馬再光在場的見證，而使《評傳》的作者認為並非全然出自謝雪紅的自由意志吧，但若比對過謝雪紅生命臨近尾聲時的相關手稿，或許不至作出如此判斷。

在討論這份手稿遺言前，我們注意到近年一個十分特殊的現象，是在 2017 年 6 月 15 日由民視貼在網路 Youtube 上「民視台灣學堂」《台灣事件簿：謝雪紅傳奇一生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影片中，主講人陳芳明在談到臨終前的謝雪紅時，不僅完全忘記自己在《謝雪紅評傳》寫過的上述內容，甚至杜撰了謝雪

---

誇稱，台共是在中共直接協助下建黨，只不過是因為有彭榮一人在建黨大會上出現」的錯誤認知。參林瓊華（2010），頁 159。

<sup>5</sup> 《謝雪紅評傳》一書自 1991-1996 年於前衛出版社再版數刷後，2009 年於麥田出版社以「全新增訂版」為宣傳重新出版，可謂長銷的台灣歷史類著作，可惜書中許多嚴重的錯誤迄今並未更正。

<sup>6</sup>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9 年），頁 518。

<sup>7</sup> 陳芳明（2009），頁 518。

紅的話語，指其告訴楊克煌：「我這一生從沒有犯錯」<sup>8</sup>，這是完全與事實背道而馳的說法。<sup>9</sup>若對照在 1997 年即已出版的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所刊載的手稿，在這篇寫於 1969 年 5 月 11 日，也即逝世前一年半的遺稿中，謝雪紅坦然承認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中，確實有很多思想上的錯誤，<sup>10</sup>她辯證地釐清錯誤的性質，認為自己幾十年來與反動路線的鬥爭中，雖也曾為執行者，但因為很快被權力中心所排除且不信任，所以她認為自己的錯誤（在辯證上）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若她承認自己的錯誤是主要的，則與之鬥爭終生的反動路線者的

<sup>8</sup> 參該片 21:55 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tFGVjwGLo&feature=youtu.be> 本片有關謝雪紅史實的部分，錯誤實不勝枚舉。除了一些基本資料如謝雪紅是 1919 年赴神戶（非 1920 年）、她在上海五卅運動遊行中喊的口號是「收回台灣」（而非陳芳明所說的「解放台灣」——「解放」一詞與「收回」的政治涵意與脈絡是不同的，尤其當時謝雪紅尚未加入共產黨），包括她和林木順如何抵達莫斯科的情節，更是戲劇性地稱他們是藏身船艙底層運煤處的一只木箱裡。實則謝雪紅已在 1997 年出版的自傳中清楚說明，她和林木順是於 1925 年 11 月 20 日在上海搭乘蘇聯商船到海參崴，一週後再換火車抵達莫斯科，前後共費時廿八天，參《我的半生記》（2004），頁 195。另包括陳芳明指二二八事件期間，「蔣經國來台灣，就是特地要找她（謝雪紅）」（該片 20:45 處）。據他的說法，因為他們在莫斯科留學時認識，而且因為「她（謝雪紅）是唯一武裝起義的人」——這樣的說法，不僅於史料無據，也對二二八事件時台灣的武裝抗爭狀況有著錯誤認知。因為「二七部隊」並非全台唯一武裝的民兵部隊，嘉南地區也有由張志忠、陳篡地、許分等人成立的「台灣民主聯軍」；高雄地區也有由高雄中學、高雄工業學校、高雄商業學校及高雄女中所聯合組成的學生武裝團體。很遺憾地，在一手史料《我的半生記》已出版多年，陳芳明在麥田出版公司再版的《謝雪紅評傳》也宣稱是「全新增訂版」的近十年後，不論書冊或相關演講，陳芳明從不願虛心參考已出土的新史料及近人研究成果，修正自己原來的錯誤認知，而且變本加厲地遺忘多處自己在《評傳》書寫過的內容，隨心所欲地加油添醋，編織歷史情節，做錯誤的史實傳播。而一個原來立意良好的節目，因衝著對講者的高知名度所生的尊重與信任，在專業編審機制闕如的製播過程中，如何避免類似情況繼續發生，恐怕也是需因應檢討的。

<sup>9</sup> 陳芳明教授在「民視台灣學堂」有關台灣政治運動史系列裡的講談影片，與史實悖離的說法實在不少。譬如在今年 2018.04.26 有關「二七部隊」主題的敘述中，竟宣稱「二七部隊他們所有的人，沒有一個人死掉」（該片 5:03-5:08 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LtIXqymvM>），但根據堅守到最後烏牛欄戰役的黃金島先生在 2004 年出版的回憶錄《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所述，當時駐守溪南有四位同志在撤退時遭到射殺（頁 122）。而今年由台中新文化協會製作，李佳懷導演，有關「二七部隊」歷史的影片《武裝台中》，埔里在地耆老詹明和先生也又指認出一位被槍擊死亡的無名部隊成員的倒地位置，故據目前所知有至少五位「二七部隊」的戰士死亡。另外陳芳明也在片中指稱「她（謝雪紅）到香港之後，就立刻成立了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解放聯盟成立之後，她就在那裏遇到了廖文毅……」（該片 22:04-22:14）這段明顯錯誤且時序混亂的敘述，令人驚愕。因為眾所周知，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的是廖文毅；謝雪紅在香港成立的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前者最初於 1947 年 6 月由廖文奎、廖文毅、林木土等人成立於上海，但未有正式組織；隔年二二八事件一週年紀念時，希望擴大影響力，以原來基礎於香港結合如蕭來福、潘欽信等台共份子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謝雪紅等人與廖文毅在香港曾有短暫合作，廖曾參加謝氏等左派人士成立的「台灣問題研究會」，並資助過《新台灣叢刊》。關於這段互動經歷，可參拙作〈戰後台灣左翼者進入中國前夕的政治理想與失落——以創刊香港的《新台灣叢刊》為析例〉，收入《三代台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台北：遠足文化，2017 年），頁 215。

<sup>10</sup>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再版）（台北：楊翠華自費出版，2004 年），頁 3。關於謝雪紅這段為自己的錯誤性質辯證式的文字，可參拙作〈背叛與沉冤的辯證：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收入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台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7 年）。

罪惡，便會被減輕，古往今來，使千千萬萬個革命者之所以步上革命之途的「大非大是」這個終極理由便會顛倒過來；被犧牲的將不只是革命者的人生，而是使革命者成為革命者的真理。<sup>11</sup>

而當謝雪紅最在意的「左」，在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中被其強調的「獨」所凌駕，台灣社會著實有不少關心謝雪紅歷史的讀者，也被帶往謝雪紅是主張台獨的認知。<sup>12</sup>筆者近年在與謝雪紅主題相關的演講或新書發表會後的新聞媒體報導中，也充分感受這股台灣集體意識於謝雪紅這位歷史人物身上的反響。譬如在以討論「二七部隊」歷史為主題的《青春二二八》新書發表暨座談會發言時，筆者雖在發言一開始便清楚表示，謝雪紅在台灣政治光譜上是個奇特的存在，因為統派認為她是統派，而獨派認為她是獨派。但因其身處連續殖民體制中，在不同的國族體制裡，不同階段的政治主張，需要從歷史脈絡來考察，除了「社會主義者」這個身分外，任何化約的政治標籤恐怕對謝雪紅都不適用——即使在如此強調的說明下，依舊有現場記者在事後報導筆者的發言時，仍直接將「左獨」標籤冠在謝雪紅頭上，再以嵌入筆者口中的形式寫出。<sup>13</sup>

如此違背事實的報導，顯然事關記者的專業素養。

但若不僅著眼於台灣新聞專業養成問題的角度，綜合上述，深究此現象，其實也反映了法國歷史學家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在其代表作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台譯為《史家的技藝》）中所說的：

「……除非誤解是與大眾的偏見相配合，否則就不會傳開，不會有生命。誤解

<sup>11</sup> 1928年回到台灣重建台共，成為職業革命家的歲月裡，謝雪紅經常說的正是：「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參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003。

<sup>12</sup> 筆者於去年年底（2017.12.29.）以〈一個台灣女性左翼者走過的國族之路：謝雪紅未竟的革命之業〉為題，在高雄「哲學星期五」演講，開講前先詢問觀眾的想法，現場多數聽眾確實認為謝雪紅是獨派，僅少數認為她是統派。事後筆者與高雄哲五的組織者兼主持人劉燕玉討論這個現象，就其觀察，她也認為，解嚴後的三十年來，台灣社會關於謝雪紅的史料與著作極少，讀者認識謝雪紅只有陳芳明的《謝雪紅評傳》這本專著，以及後來出版但也僅止於戰前的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多數關心台灣文化議題的讀者，確實受到《評傳》的影響不小。

<sup>13</sup> 針對今年（2018）一月二十日在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舉行的《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新書發表暨座談會上，筆者於現場的發言，被記者斷章取義地改寫，以中央社記者羅苑韶的報導最具代表性。參〈二二八武裝反抗二七部隊歷史圖像重現〉，中央通訊社，2018年1月20日。見該社電子報：<http://www.cna.com.tw/news/acul/201801200150-1.aspx>

因此是一面鏡子，集體意識從中凝望自己的樣貌。」——我們也由謝雪紅在台灣如何被視為獨派的這個誤解上，窺見台灣社會集體意識的一角：真實的謝雪紅的政治主張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集體意識投射在謝雪紅身上所顯現的自我樣貌與主觀願望。

但這個現象所隱含大眾的一廂情願、逃避或怯懦，甚至一再凸顯謝雪紅個人至超脫人性乃至近乎「聖賢」（「我一生從沒有犯錯」）的媚俗，容或含著眼前仍續存於殖民地台灣歷史脈絡下的悲情，卻恰恰不是謝雪紅的人格與精神該留給台灣後代的教養。身為一個負責的歷史研究者，也有義務為此間對謝雪紅的誤解，做一點嘗試釐清的努力。因為更重要的是，不論主張台灣應「高度自治」的社會主義者謝雪紅是「左獨」或「左統」，「究明事實是一種正義」——我們從歷史中認識與領悟的，不應是昧於事實，耽溺偏執地探看自身所欲，而是從她與左翼同志們上個世紀出身殖民地台灣所經歷的革命歷程中，不惜犧牲自由與生命地為台灣尋找出路的求索與努力，讓她及同志們的挫敗、傷痛、困頓，乃至最終的毫無出路，引領我們深刻省思台灣今日的價值座標與何去何從。

本文將嘗試精簡地從歷史脈絡回顧謝雪紅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中，綜論關於謝雪紅的「左獨」、「左統」與「民主自治」的政治理念，並探究每一個理念在相應的客觀環境中所遭逢的實踐困境與歷史因素。

## 二、「左獨」的開端：日本殖民時代的共產國際台共份子

### （一）中共做為台共誕生的最初推手

審視年輕的謝雪紅步上社會主義之路的歷程中，中共所扮演的角色，無疑是十分關鍵的。這一點不僅無須迴避，反而應坦然正視，因為這是台灣真實行過的歷史道途。透過中共，來自日本殖民地台灣的謝雪紅及其左翼同志林木順一起朝向共產國際的莫斯科。這趟三〇年代的遠行，正是社界社會主義思潮蓬勃的時局，我們看見台灣的革命運動曾與世界的連結。

出身殖民地台灣下層社會的赤貧家庭，謝雪紅從童年至青少年，飽含了貧窮所致的憂患、苦難與絕望。1919年初，她脫離奴隸般的養女生活，以張樹敏的妾的身分，第一次離開台灣赴神戶、青島，乃至1925年再赴上海；她的物質處境雖有了改變，但長久以來積蓄於生命中，對身為殖民地貧窮女性無能自主的深刻體驗，在離開故鄉的行旅中，一站站地開始發酵。從仍在日本「米騷動」遺緒中的神戶，她初次見識了窮人的反抗行動帶來的改變；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青島，使她如夢初醒地體會甚麼是「革命」——她被一張描繪兩年前才爆發的俄國革命的圖片所震撼，甚至從「謝氏阿女」改名為「謝雪紅」；提醒自己永誌不忘這茫茫雪地中的血跡，那是革命所需的犧牲中留下的印記。

及至1925年第二次抵上海，正逢如火如荼的五卅運動。當時人已在杭州一中的林木順，受到中共黨員俞秀松及宣中華、吳先清夫婦很重要的提攜與照顧。<sup>14</sup>謝雪紅會踏上革命之路，愛人同志林木順是重要的橋梁，也是使謝氏與中共黨員黃中美產生連結的關鍵者。兩人在杭州期間改名為林木森、謝飛英，並在中共特意栽培下，分別以正取生及特別生進入上海大學社會系。<sup>15</sup>同年10月，在中共更進一步推助下，兩人與中共前往共產國際的總部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КУТ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Востока），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

謝木森與謝飛英這兩位台灣人來自中國，一開始進入東方大學人數最多的中國班級，但因不諳中文，後被轉往日本班。謝雪紅也因此開啟了與日共密切的關係，對日後創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有深刻的影響。

## （二）主張「消弭階級」、「台灣民族獨立」的台灣共產黨

列寧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中曾提出，「共產國際必須幫助殖民地和落後國家中『未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分子組織起來，建立新型的政黨』」、「殖民

---

<sup>14</sup> 林炳炎（2013），頁61-62。

<sup>15</sup> 林炳炎（2013），頁66-67。

地母國的共產黨必須支援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運動，並負有指導殖民地建立共產黨的責任」。<sup>16</sup>在共產國際為幫助日共解決內部問題所撰寫的「一九二七綱領」中，片山潛於討論會後告訴日本班的委員，會議中決議，「日本無產階級必須援助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的革命鬥爭，要幫助台灣無產階級建立共產黨」，綱領中也提出「殖民地完全獨立」的主張。

在這樣的背景下，共產國際委由日共協助台共的創建工作，當時仍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於 1928 年 4 月 15 日於上海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簡稱「台灣共產黨」。在台灣尚未獨立建國前，先以支部身分附於日本共產黨。

迥異於過去 1914 年「同化會」成立以來，經「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這條從體制內希望台灣人能實現自治理想的路線，1928 年台共的返鄉，是殖民地台灣第一次出現主張以革命行動推翻日本殖民政府的階級運動。雖然歷經日共的嚴密監控、內部「改革同盟」成員對謝雪紅、楊克煌等「國際書局」一系的鬥爭，台共在歷史上只短暫存在了四年多，但透過〈一九二八台共政治大綱〉〈一九三一台共政治大綱〉後稱「一九二八大綱」、「一九三一大綱」，我們看到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有了清楚定義「台灣民族」、主張「廢除階級的民族獨立」、「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文件，也看到背後為共產國際深刻影響的歷史背景。

這兩個「左獨」的革命綱領，皆與共產國際運動密切相關。但首要注意的是，此時此處的「獨立」，對台共黨人而言，是指台灣獨立、脫離於日本統治之外。

從「一九二八大綱」至服從共產國際所成立的改革同盟新訂的「一九三一大綱」，台共前後在「台灣獨立」的立場上沒有改變，因為台灣民族未來將脫離日本這個異族的殖民統治，而從共產國際揭櫫的「一黨一國」原則而言，台灣共產黨將來的建國目標也是清楚的。

---

<sup>16</sup> 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頁3。

但兩個綱領最大的不同，是後者受到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關於資本主義第三期理論的影響，以更激進左傾的方式批判台灣的資產階級依附日本帝國主義，認為是革命的障礙，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結合農工大眾與小資展階級去推動革命的力量，在工廠進行階級鬥爭與武裝革命，以完成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施土地革命，建立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sup>17</sup>「改革同盟」這個升高鬥爭態勢的新綱領，顯示台灣革命深刻受到共產國際理論與政策調整、改變的影響。這也是謝雪紅對於 1930 年年底，來自代表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委員瞿秋白的指令，透過翁澤生傳達給島內「改革同盟」一系，令她改變原來被認為保守、不作為的「不動主義」、「閉門主義」的狀態時，謝雪紅深感這種對殖民地、半殖民地與台灣本地農工革命運動的特殊條件無能區分的看法，不僅冒進，而且是「對台灣情況無知者的妄論」，因此難以肯定是東方局的指令而拒絕服從。<sup>18</sup>

「改革同盟」向謝雪紅所代表的舊中央的奪權行動，於焉開始。另立新的黨中央後，台共也形成了「黨中有黨」的局面。

在謝雪紅一生充滿驚滔駭浪，與死亡幾度擦身的革命生涯中，她違逆權力中心，自主判斷並自我承擔與面對的處事態度，一直令人印象深刻。

發生在 1930 年的這場台共內部分裂問題，表面看來，是謝雪紅與「改革同盟」對台灣社會性質的觀點差異，所衍生因運動策略不同而產生的內部鬥爭，但在「改革同盟」背後下指導棋的共產國際的角色，尤須認識。今日重讀謝雪紅當年被日警逮捕後，留下精彩的〈預審庭供述要旨〉<sup>19</sup>，除了呈現她對台灣社會運動的分析與觀點外，也透露了對性別問題的質疑與反省。進一步而言，這場鬥爭下所潛藏的，其實是父權政治的性別歧視問題。<sup>20</sup>

另一方面，當我們透過「一九二八大綱」，檢視有關「台灣民族」在歷史上的

<sup>17</sup>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台北：前衛出版公司，1990年)，頁 116-117。

<sup>18</sup>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頁 116。

<sup>19</sup> 《共產主義運動》，頁 125-132。

<sup>20</sup> 關於謝雪紅與父權政治的問題，也是台灣政治史上第一場有跡可循的性別鬥爭。可參拙作，〈一個台灣殖民地左翼女性經歷的父權政治重圍：謝雪紅與她的男性同志及政敵(1928-1970)〉，收入《台灣史學雜誌》第 23 期(張炎憲老師逝世三週年紀念專號)，2017 年 12 月，頁 8-37。

發展內容與「由誰來組成」的問題上，可以看見其清楚地闡釋，自十六世紀前半期至綱領寫就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台灣民族」是由最早的原住民與中國南方漢人移民所組成。這個認知，也長遠地影響了謝雪紅有關台灣自治的理念，甚至戰後歷經二二八事件，流亡中國之後，她的愛人同志楊克煌曾於 1948 年在香港期間提出〈台灣特殊論〉<sup>21</sup>，也在整風運動後的 1954 年，向中共中央提出「台灣為另一民族」<sup>22</sup>。

必須提醒的是，一國之內，原來就可以由多民族所組成。也就是說，儘管謝、楊兩人認為台灣在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下，不論在政治、經濟、語言、文化、風俗習慣等各方面，都已發展出與中國本土漢族有別的面貌，台灣省與中國其他各省相較，有其特殊性，甚且不同於中國漢民族及其他境內少數民族，而是自成一族了，但也並非是「一族一國」。戰後迫於國際局勢，改變了政治立場的舊台共，面對二二八事件肇禍的國民黨帶來的白色祖國，以及從國共戰爭時便支持國民黨的美國，在台灣內部腥風血雨未歇，人民手無寸鐵的現實下，台共與擁有共同敵人的中共合作，不僅是在左的意識型態上相契，事實上欲推翻國民黨在台灣的貪腐統治，左翼者幾乎沒有其他選擇了。接受與中共未來組成的「民主聯合政府」後，謝雪紅與舊台共同志們，正式從日本殖民時期的「左獨」變為「左統」。

### 三、從「左獨」到「左統」：戰後變色的兩個祖國

#### （一）戰後初期白色祖國中的紅色行動

戰後日本殖民政府因戰敗而撤離，台灣人次等日本國民的身份從此褪去，新的中國國民身份誕生。但未及一年半的時間，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爆發，白色祖國帶給台灣比日本異國更大的災難與苦痛。

---

<sup>21</sup> 謝雪紅（2004），頁 324。

<sup>22</sup> 楊克煌，《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自費出版，2005 年），頁 355。但在謝雪紅的《我的半生記》（2004）中，則記為 1953 年，頁 325。

台中文化人莊垂勝之子林莊生，曾描述戰後台灣社會的民心狀態：

老實說，我們很了解祖國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加上八年的抗戰，國力消耗殆盡，對它物質上的落伍是有心理準備的。我們所沒有料想到的是，中國人對國家社會毫無責任感，而其公共道德（包含軍隊規律）之墮落是到了如此地步。我們受驚的程度真像一群小孩，滿以為祖母來了，擁上開門，而見到的卻是『虎姑婆』。」<sup>23</sup>

林莊生說，剛從日本五十年統治解放出來的台灣人，每個人都痛定思痛，一心一意想把台灣建設好，人人自愛，遵守國家法令，對國家財產之愛護猶如自己的財產，若有不肖之徒敢犯法或染指，便會受到社會輿論的制裁。此時台灣人民自尊自重，志向與操守的水準都太高，在如此純潔的精神狀態下，對貪官污吏痛恨的程度，不是國內人士所能想像的。<sup>24</sup>

「光復當初，民眾對國家財產的損失斤斤計較，是因為大家覺得『台灣是我們的』。而此時民眾眼見國家財產被盜而無動於衷，是因為大家覺得『台灣是人家的』。既然是人家的，何必去管它？」<sup>25</sup>

這段回憶，深刻記述了一段戰後台灣人身在自己家園卻失去家園的痛史。

但即使白色祖國帶來的創傷如此深重，當時台灣島內也未有要求獨立的訴求或聲浪，各界最普遍的意志交集，是對台灣自治的期望。這一點，戰前曾主張「左獨」的舊台共如謝雪紅，歷經戰前台共事件在獄中七年半因病危出獄後，與楊克煌經營拖鞋加工廠與三美堂等，短暫經歷幾年「無可作為」的歲月。及

---

<sup>23</sup>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台北：玉山社，2017年），頁114。

<sup>24</sup> 林莊生（2017），頁115。

<sup>25</sup> 林莊生（2017），頁115。

至時局丕變，日本戰況惡化，她與楊克煌開始尋覓戰前抗日的左翼同志，成立「台灣人民協會」。楊克煌甚至在 1946 年六月間，於台北的左翼成員廖瑞發家中，舉行了「中國共產黨台灣工作委員會」及「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員會籌備會」的聯席會議，座中中共地下黨代表成員即省工委會副書記張志忠。<sup>26</sup>我們也再次提醒，進入戰後，不論是左翼份子組成的台灣人民協會，甚或二二八事件期間在台中組織民兵「二七部隊」，與國民黨展開生死殊決，謝雪紅等舊台共從此未再提出任何有關台灣獨立的想法或行動。相反地，這群以社會主義為其國家——民族想像共同體方向的老左派們，已開始不定期聚會，互相交換關於紅色祖國的動態與訊息，並在流亡後強烈批判有美國影響的「右獨」路線。

此時，中國內部的國共鬥爭仍熾，中共早在 1945 年 9 月派遣出身台灣彰化，並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蔡孝乾至江蘇淮安，與華東局商討在台灣的建黨工作。1946 年 3 月，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於淮安成立，由蔡孝乾擔任書記。同年四月，省工委幹部們開始潛入島內，展開地下組織的工作。<sup>27</sup>

根據台灣人民協會台北分會籌備委員周青的回憶，戰後初期，人民協會台北支部的成員在台北成立了一個具左派反日色彩的「不定期會」，這個由台灣左翼成員組成的團體，「研討祖國抗日的最新形勢，有關延安的各種消息，歐洲反法西斯戰線的進展，和窺察日軍在侵略戰爭中不斷『轉進』的敗象來向台灣人民進行宣傳。」<sup>28</sup>

周青說，謝雪紅曾準備從人民協會中挑選優秀份子建黨，後得知中共將派人來台，才停止這個建黨計畫。這個建黨計畫，也就是蘇新在回憶錄中曾提過的「前衛黨」<sup>29</sup>，但當時因尚未與中共取得聯繫而擱置。很清楚地，戰後以謝

<sup>26</sup> 楊克煌 (2005)，頁 249。

<sup>27</sup> 參林邑軒，《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58-59 及頁 97-98。

<sup>28</sup> 據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海峽評論》三十七期，1994 年 1 月，頁 48-49。

<sup>29</sup>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1993 年)，頁 114。關於戰後初期台灣左翼成員的活動，也可參拙作，〈背叛與沉冤的辯證：關於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收入《青春二二八：「二七部隊」的抵抗、挫折與流轉》(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7 年)，頁 17-71。

雪紅為代表的台灣左翼份子，二二八事件之前，已開始尋求與中共地下黨的連結；事件後，在台中主張武裝抗爭的謝雪紅所組織的「二七部隊」過程，不僅與地下黨書記蔡孝乾和副書記兼武裝部長的張志忠保持聯繫，隊伍中也有謝雪紅自己親信的「紅色子弟兵」。<sup>30</sup>

此時，匯入中共革命運動中的台共，已非如早期具有獨立擬定屬於自己政黨綱領的權力，我們確實已未能再見如〈一九二八台共政治大綱〉、〈一九三一台共政治大綱〉這樣的政治文件。<sup>31</sup> 衡量現實狀況，對中共而言，收服逃亡到台灣島上的國民黨，是它完成中國革命最後的一塊拼圖，它需要島內提供的裡應外合以加速革命的進程；對謝雪紅等左翼人士而言，台灣眼前這個集諸惡於一身的國民黨政權，正佔據著故鄉，他們亟需具體的革命援助，不論從正式軍備、軍資或組織戰的策略，都是中共可以提供的。所謂「敵人的敵人」正是朋友，沒有足以打正規戰裝備和條件的台灣武裝民兵，可以一時嚇阻敵人，但在國民黨的優勢武力下，長期而言難以逃脫被鎮壓的命運，而正與國民黨處於戰事狀態中的中共，自是被不願繳械為奴的台灣人所冀望。

據政治思想史學者吳叡人進一步的分析，他認為戰後中共地下黨在台灣二二八事件之後，之所以能迅速發展，除立基於台灣社會的不滿、本身強大組織力的奧援上，更因為掌握了戰後兩年內在社會內部形成的族群（省籍）矛盾，以及對「台人治台」的強烈政治期待，而能與不同政治傾向的台籍人士建立起鞏固的結盟關係。<sup>32</sup> 另者，就全中國視角觀之，中共在台灣當時不僅以進步勢力之姿出現，且在中國內戰中正取得節節勝利，可謂取代國民黨的唯一且合理的選項。其次，就台灣當下現實而言，中共也是唯一具有足夠的資源（物質、人力、組織、理論、宣傳與武力）及實力，能在國民黨軍事支配下進行全島性

<sup>30</sup> 這群「紅色子弟兵」以何集淮、蔡伯璦、曾永賢、呂煥章等人為代表。參林瓊華（2017），頁 43。

<sup>31</sup> 吳叡人（2016a），〈從自主到從屬：《新台灣叢刊》與戰後初期台灣左翼思想的變形與死亡〉，《台灣史料研究》第 48 期，2016 年 12 月，頁 130-131。

<sup>32</sup> 吳叡人（2016b），〈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收入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16），頁 65。

組織、宣傳與動員的政治反對勢力。<sup>33</sup>

這也清楚解釋了，為何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地下黨吸收的最主要對象，是對意識型態特別敏感的知識份子，如教員、醫生、學生、文化人等。而大部分投入地下黨組織的知識分子，與其說是左派，不如說是出於理念與現實雙重因素的自由主義者或人道主義者。對他們而言，台灣獨立之所以未被接受，除意識型態外，現實可行性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sup>34</sup>

1949 年初，中共省工委會蔡孝乾提出對台的工作方針：「加緊積蓄革命力量，在決戰前避免遭到敵人殲滅性的打擊，在反政府的廣泛基礎上，以大家都是本省人，本省人愛護本省人的號召來建立兩面派的政權及地方武裝……」<sup>35</sup>這正是中共擁有深厚運動策略與理論資源的運用，尤其是透過本省人認同所建立的兩面派手法，加上地方武裝，確實使得組織進展迅速。

而 1950 年關於台灣自治運動的宣傳中，其工具性策略運用的目的則更明顯：「我們估計到台灣自治的口號是台灣一般群眾要求的，故我們不要一般地反對這一口號，因為我們估計到今日最緊迫的問題就是台灣的解放，故我們也不要強調這個口號。」<sup>36</sup>

這裡，也已經清楚預告了，謝雪紅等視「民主自治」為理性政治價值的台灣左翼份子，未來將與中共產生不可避免的衝突。

## （二）紅色祖國下的台灣民主自治之路

### 1. 香港期間

1947 年 5 月，謝雪紅、楊克煌與古瑞雲從台灣左營搭乘軍艦逃亡至廈門，轉至上海後，經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赴香港。在港未滿一年的時間裡，謝雪紅

<sup>33</sup> 吳叡人 (2016b)，頁 67。

<sup>34</sup> 同上註。

<sup>35</sup> 調查局編印，《台灣光復後之「台共」活動》，1977 年，頁 36。轉引自林邑軒 (2012)，頁 75。

<sup>36</sup> 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對各縣市工委的指示〉，檔案管理局，1950 年。轉自林邑軒 (2012)，頁 75。

等人做了兩件比較重要的事：一、創辦「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二、創辦《新台灣叢刊》。

「民主自治」可說是舊台共謝雪紅放棄早先的台灣民族獨立後，在戰後信仰的核心政治價值。「台盟」綱領草案上第三、四、五、六及十五條強調：

省為地方自治最高單位，省與中央政府權限之劃分，採取均權主義，省得自制定省憲及選舉省長。

實行台灣省澈底的地方自治，省長、縣長、市長、區長、鎮長、鄉長、一律由人民直接選舉。

省設省議會，縣設縣議會，市設市議會為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之機關。

實行普選制度，人民之選舉權不受財產、教育、信仰(仰)、性別、種族之限制，廢除選舉人之公民宣誓登記及候選人之檢覈制度。

高山族人民一律平等，並得組織自治單位。<sup>37</sup>

二二八事件後，與謝雪紅、楊克煌一起逃亡的古瑞雲(周明)，曾擔任謝的秘書。晚年在其回憶錄手稿中曾對謝雪紅的想法有過這樣的說明：「謝所解釋的民主自治內涵是——設自治憲法，省長縣市長、鄉鎮長民選(即以台治台)。因為中國的傳統是中央集權，地方隸屬中央。」<sup>38</sup>

這裡古瑞雲觸及到一個重點，也是謝雪紅等人日後進入紅色祖國後遭遇的困

<sup>37</sup>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明天的台灣》，《新台灣叢刊》第三輯(香港，新台灣出版社，1947年12月1日)，頁36。

<sup>38</sup> 古瑞雲先生回憶錄手稿(未刊稿)，1：47。相關背景，亦可參拙作，〈戰後紅色祖國的「台灣民族」變奏曲——以古瑞雲先生的回憶錄手稿(1947-1976)為析例〉，收入陳君愷主編，《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論文集(台北：台灣歷史學會)，頁285。

境，值得進一步探討。

在《新台灣叢刊》第四輯《自治與正統》（1948年1月1日出版）的這篇〈自治與正統〉，便針對上述問題，做了深入的反覆析辯。由李自修以筆名「臬紹」執筆，但其實是先由謝雪紅、楊克煌、蘇新、古瑞雲等眾人共同討論的文章裡，整個歷史背景是，經歷日本五十年殖民統治，加上戰後中國國民黨政府來台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台灣人對要在中國這個政體中實行民主自治將遭遇的各種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阻礙，便是中國自認正統，「中國治台灣」是理所當然的這種在中國人之間的普遍想法。

以學者吳叡人的話而言，即是一種在中國普遍而根深蒂固的封建政治文化，「一種從上而下的，總是將地方視為勢力範圍的佔領意識。」<sup>39</sup>

由於傳統中國政治實行中央集權制，地方向來隸屬中央，所以謝雪紅等老左派們主張要落實台灣的民主自治，必須制定自治憲法。但這套台灣真自治的政治制度，要在尚未有自治經驗的中國實行，是有實際困難的。主要是在整個中國框架下，唯有台灣一省實行高度自治，將具有鮮明的「獨立性」和「排他性」。但這樣的曲解，在眼前的混亂中，這群台灣左翼份子認為沒有別的解方，只有從「事實的發展」中去得到矯正。譬如這套自治模式，不僅要在台灣實行，也應在中國各省推動。如果各省的真自治得到落實，各省透過普選，選出自己的省長，人人的政治地位平等，各省的人不僅在自己省內奉公守法，到了外省既不欺人，亦不被人欺；福建人到廣東省須如此，廣東人到北方各省也相同。透過中國各省落實地方真自治的過程，則這套出自台灣的政治思維所含帶的「獨立性」或「排外性」，就將漸次不明顯了。<sup>40</sup>

這套對紅色祖國未來政治藍圖的新願景，無疑是主張邦聯主義式的高度自治政治架構。吳叡人認為這是一個「現實、冷靜而且悲觀的論證」，且因為封建的佔領意識在中國不僅太過根深蒂固，而且是不分黨派的，所以謝雪紅等老左派們

---

<sup>39</sup> 吳叡人（2016a），頁139。

<sup>40</sup> 臬紹，〈自治與正統〉，《自治與正統》，頁21。

很清楚，即使與中共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了，台灣自治是否可能實現，還是有待觀察的。事實上，正如吳叡人所言，將具有民主自治思維的邦聯主義引進中國，確實是對中國的文化批判；因為這樣的政治形式，「需要相應的文化條件，也就是某種政治現代性的條件，例如『公民意識』，以及對民主價值的基本信念等」。<sup>41</sup>

這個現實的困境，其實也如一則預言，正是謝雪紅及其主張民主自治理念的台灣左翼同志們，與中共之間最大的價值衝突。

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每一次的政治運動中，不唯主張台灣高度自治的謝雪紅受到嚴厲的批判，被周恩來喻為「瓊崖人民的一面旗幟」的海南島中共解放軍瓊崖縱隊司令馮白駒（1903-1973）、廣東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古大存（1896-1966）、廣東原華南局書記的方方（1904-1971）等這些獲得地方人民肯定的政治菁英，都在反右運動中被批為「地方主義者」。這也清楚顯示了，「民主自治」在紅色祖國落實的艱難。

## 2. 進入中國

1949年10月之後，進入中共掌政的紅色祖國，「台盟」作為中國八大民主黨派內的一份子，與中共共同成立了「民主聯合政府」。然而一心對台灣民主自治的政治理想念茲在茲的謝雪紅，很早便使中共起了「戒心」。那是1950年的5月17日，距離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駐進台灣海峽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中共決定派三野副司令粟裕，率領五十萬軍，華東野戰軍（三野）決定九兵團、十兵團攻打台灣。「中共華東局也內定，取下台灣後，將由粟裕擔任台灣省省主席，蔡孝乾和謝雪紅任副主席。這個派任外省人擔任台灣首長的決定，完全不符合民主、自治的主張，謝雪紅堅決反對，甚至對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拍桌怒罵。」<sup>42</sup>

謝雪紅的憤怒，驚動了中共高層。也使我們回顧僅僅兩年多前，寫於香港的

---

<sup>41</sup> 吳叡人（2016a），頁139。

<sup>42</sup> 參林瓊華（2017），頁224。

〈自治與正統〉這篇文章裡最後的結語：

當前國民黨政權正在沒落中。可是，台灣真自治還是要靠台灣民眾自己去繼續二二八的實踐而取得的。因為中國的正統觀念不會因為國民黨政權的崩潰而立刻消滅的。即使國民黨政權倒了，假使所謂聯合政府成立了，那個時候『中國治台灣』的正統觀念還是仍舊要驅使新中央政府派遣新的省主席去主持台灣——那個時候，在台灣僅僅仍將是迎新送舊而已罷了。<sup>43</sup>

從這裡，我們也清楚看見，作為強勢者的中共，對自己即將驅除國民黨，完成中國自身的革命任務，並不需要經過台灣人民的同意。於是我們也再次複習了，在中國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中，「一種從上而下的，總是將地方視為勢力範圍的佔領意識。」<sup>44</sup>

謝雪紅的激烈反應，也很快地使中共決定對她做出處理。1951年8月，原來中共為統戰需要而給予的許多職銜：政協全國委員、全國婦聯執委、民主青聯副主席、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暨第二副書記）等，全被卸下。在整黨、整風運動開始後，她被冠上各種羅織的罪名：「二二八的逃兵」、「捲款（十萬元）潛逃」。<sup>45</sup>

關於謝雪紅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的經歷，由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所編載的《關於清除黨內右派份子的決定匯編（一）》，於1958年2月12日留下了中共對「右派份子」謝雪紅的政治結論。

批鬥謝雪紅的會議，從1957年11月10日到12月8日，舉行大會十五次，小會五次，共二十次，開會時間總計約一百小時。謝雪紅在檔案中被認為態度十分惡劣，且一再向會議提出抗議。在這份檔案裡，中共從「台灣自治」及「獨立

---

<sup>43</sup> 臬紹，〈自治與正統〉，頁23。

<sup>44</sup> 吳叡人（2016a），頁139。

<sup>45</sup> 相關討論，可參林瓊華（2017），〈背叛與沉冤的辯證：關於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

民族」的角度來詮釋、批判這位出身殖民地台灣，戰後以來始終在中國的架構中堅持民主自治的社會主義者。如果謝雪紅會成為今日台灣社會認知的台獨份子，溯本追源，也許這份中共官方對她為何是一名「右派份子」的定義，也有部分貢獻吧。

由於這份結論不僅以反面方式為我們呈現了謝雪紅政治主張的樣貌，也充分使我們看見中共官方在 1958 年對謝雪紅有關台灣自治的政治定調，值得抄錄下來，做進一步的探討。

關於謝雪紅「主要反動言行」的第一條：

在台灣問題上，有一套反動的理論和政治綱領。謝雪紅主張台灣「自治」、「高度自治」、「台人治台」。這種主張，實際上是要台灣成為一個獨立王國。她和楊克煌都說：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是一個「獨立民族」。事實上，台灣人除少數高山族以外，都是漢人民族，決不是一個獨立民族。謝又強調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大陸有不同的特徵，台灣人與大陸人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特殊的政治要求。根據上述理論，即獨立民族和台灣特殊的理論，她堅持要求台灣「自治」，說「自治是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的要求，反對自治就是台灣人民和台灣歷史的罪人」（鬥爭大會上說的）。

她的所謂「自治」是要求「省、縣、市長，都要選舉台灣人」（在黨組會議上說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台盟華北總支部，台灣要要在北京設立一個機構，「與各國通商」。她還組織了一個文化企業公司，在籌備會上，她答應這個公司將來可以回台灣接收文化企業。顯然的，她的所謂「自治」，實際上就是台灣獨立。

謝為自己辯護，說她講自治是講歷史，不是政治主張。事實不是如此。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共中央關於紀念中國政府在台灣受降十週年的指示中提

到，在宣傳上就反對所謂的「自治」。當李純青同志向她傳達時，她即表示反對。她還說：「如果今天反對自治，在大陸上的台灣也會覺得奇怪」，她在紀念會上竟避而不提反對自治。……在鬥爭會上，她還說不能打擊現在台灣的人要求自治，這種打擊「是殘酷的」。她並且悍然宣稱：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名稱不能改，「自治」兩字不能取消。

台灣人不是少數民族，姑不論主張自治是否即主張台獨，主張台灣自治就是違背憲法第三條及第四節第五節各條的規定。<sup>46</sup>

從上面這份檔案中，我們看到謝雪紅有關「台灣自治論」、「台灣特殊論」的生動側影。顯然〈一九二八台共大綱〉中對台灣民族的定義，仍深刻影響謝雪紅和楊克煌。但這裡也顯示，中共的民族論完全是血統論，一方面它只看見台灣漢人，卻完全忽視台灣的原住民族群的存在，另一方面原漢通婚後的子女，也仍被視為漢人——這種僅單面強調漢民族移民的血緣論，可說是典型大漢（大中華）沙文主義觀點，也是落伍的父權／霸權觀。

再者，中共針對謝雪紅的自治理念與台獨的連結及認知，基本上也完全不脫十年前（1948年1月），剛歷經二二八事件，聚集香港的左翼台灣人所寫的〈自治與正統〉所呈現的分析論點。在這場反右鬥爭下，謝雪紅被解除所有職務，職位從八級降為十二級，被批為「右派份子」的罪名，直到臨終前並未被平反。在檔案中「結論」一節，最後對被劃為資產階級的她批判如下：「右派

---

<sup>46</sup> 原檔案來源：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辦公廳編，《關於清除黨內右派份子的決定匯編（一）》，1958。宋永毅主編，〈謝雪紅中國共產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黨組關於右派份子謝雪紅的政治結論〉，《千名中國右派處理結論和個人檔案》（電子書，國史出版社，2015），W-Y，第五冊。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最早頒布於1954年的版本，第三條的章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這份建國初期所訂定的憲法，實看不出謝雪紅的自治主張，如何違背上述最後一條而有分離、獨立的企圖。

份子謝雪紅是一個叛徒，是混進黨的階級異己份子，是一個政治野心家，其為害極大，屢教不改，把她開除出黨是完全正確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謝雪紅在反右時期被控的罪狀再度被提出來批鬥。1968年1月，被開除中共黨籍。1970年11月，文革尚未結束，謝雪紅病逝於北京。直到1986年9月，中共平反後，將其骨灰移放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生前被中共「屢教不改」的謝雪紅，對台灣民主、自治的信念始終不移。但只要中國政治的中央集權統治文化依舊鞏固，「自治」作為一種進步的民主實踐概念，便會被中共帶向「脫離母國」的認知。所以即使仍牢牢身處中國政體內，謝雪紅既未主張「台盟」要擁有自己的軍隊，也未擘劃以獨立「台盟」建國的名義與各國建立邦交——僅僅是在北京建立一個可與各國通商的據點，已被中共批判為「台灣獨立」。這種政治概念認知上的巨大鴻溝，建立在中央集權制對控制的強烈需求上。進入廿一世紀的中國，官方透過各種辨識科技高度控管國民，也是中央集權主義的另一當代註腳。

#### 四、結語

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意識。

「自治」和「獨立」是兩組不同的政治概念。「獨立」必涵括「自治」（self-government）這個「自我管理」的必要基礎；但「自治」無法完全涵納「獨立」這個包括國防、外交、主權國家的條件。

回顧身處不同國族體制下謝雪紅的政治主張，「左獨」其實只存在日本殖民時代共產國際的政治架構下的台共時期（1928-1931），並且是以獨立於日本為訴求。雖然隨著台共的建立所產生的定義台灣的論述，特別是謝雪紅參與的「一九二八台共大綱」，其中對台灣民族的定義，例如「台灣民族是另一民族」、「台灣特殊論」，皆深刻影響謝雪紅於戰後主張的政治理念，但自日本戰敗撤離台灣，到中國國民黨的白色祖國流亡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947年，台灣

社會並無獨立的訴求。即使在二二八事件中採取武裝抗爭的謝雪紅，與國民政府進行生死對決，卻也從未在當時祭出獨立的旗幟——不僅因為現實上近乎不可能實現，更因為謝雪紅自年輕時 1919 年初赴青島，在此地開啟了漢民族精神、階級鬥爭思想，以及對幸福社會的憧憬，祖國意識也隨之而生。<sup>47</sup>

1925 年夏天於杭州投入五卅運動期間，她曾以謝飛英的名義，由林木順或陳其昌執筆，代她寫了一封簡單的信給浙江日報：「愛國同胞們！豈不是把台灣忘掉了嗎？為什麼只提出收回租借、收回海關、收回領事裁判權、收回一切不平等條約，而卻沒有提到要收回台灣啊？」<sup>48</sup>

「收回台灣」，清楚說明謝雪紅的祖國意識：從日本異族手中收回台灣到祖國（中國）手上。日治時代的台灣，富祖國意識的人並不在少數，謝雪紅也並不特殊。但會在這個時期便強烈主張「收回台灣」，恐怕是台灣人中罕見的。但這與她日後的台灣民族論、台灣自治論，也並無衝突。戰後流亡中國期間，她的「自治左統派」身份也與年輕時以來的祖國認同、戰後的台灣自治論沒有違逆。

殖民地台灣左翼者們自日治時期、白色祖國、紅色祖國，一路反抗帝國強權，屢敗屢戰的革命歷程，在近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政治結構與歷史磨難中，終於未能實現以紅色祖國之力，奪回被流亡的中華民國及美軍所佔領的故鄉。而在過世之後，連骨灰返鄉的心願也無力達成的謝雪紅，最終留給台灣後人的，或許正是她以肉身為證，以生命為柴燒，為我們示現了她奮力搏鬥，最終無聲倒下的所在，沒有自主台灣人的出路。

但我們豈會忘記，她為殖民地台灣所刻劃的，每一個力抗強權的不服從身影？這個自主女性的精神，將為我們深深牢記，不論她是「左獨」或「左統」，在她一生誠然大多處於失敗的黑暗中，那顆始終躍動著的無畏之心，便是歷史之神獻給一個弱小民族最珍貴的寶藏。

<sup>47</sup>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 129-131。

<sup>48</sup> 謝雪紅，《我的半生記》，頁 176。底線為筆者所加。

## 參考書目

### 史料

- 古瑞雲，《古瑞雲回憶錄手稿》（未刊稿，1995年）。
- 臬紹，〈自治與正統〉，收入《自治與正統》，《新台灣叢刊》第四輯（香港：新台灣出版社，1948年01月）。
-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綱領草案〉，收入《明天的台灣》，《新台灣叢刊》第三輯（香港，新台灣出版社，1947年12月）。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王乃信等譯，漢譯本《台灣社會運動史》（1913-1936），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台北：創造出版社，1989年）。
- 黃金島，《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台北：前衛，2004年）。
- 楊克煌，《我的回憶》（台北：楊翠華自費出版，2005年）。
-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自費出版，1997年）。
-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3年）。
- 宋永毅主編，〈謝雪紅中國共產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黨組關於右派份子謝雪紅的政治結論〉，《千名中國右派處理結論和個人檔案》（電子書），W-Y，第五冊（國史出版社，2015年）。

### 專書

- Marc Bloch, *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 Paris : A. Colin, 1949
- 布洛克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年）。
- 林炳炎，《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創立》（台北：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資料中心，2013年）。
- 林莊生，《懷樹又懷人：我的父。親莊垂勝、他的朋友及那個時代》（台北：玉山社，2017年）。
-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出版公司，1991年）。
- 陳芳明，《謝雪紅評傳》（台北：麥田出版公司，2009年）。
-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台北：前衛出版公司，1990年）。

### 期刊論文、學位論文、書評

- 吳叡人，〈從自主到從屬：《新台灣叢刊》與戰後初期台灣左翼思想的變形與死亡〉，《台灣史料研究》第48期（2016年12月）。
- 吳叡人，〈三個祖國：戰後初期台灣的國家認同競爭，1945-1950〉，收入蕭阿勤、汪宏倫主編，《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2016年）。
- 林邑軒，《來自彼岸的紅色浪潮：從意義中介視角重構戰後初期「省工委」的地下革命行動》（台大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周青，〈「歷史造像論」的實踐——評陳芳明著《謝雪紅評傳》〉，《海峽評論》三

十七期（1994年01月）。

林瓊華，〈流亡、自治與民主：試論陳芳明著作《謝雪紅評傳》之貢獻及其爭議〉，《台灣風物》第六十卷第二期（2010年06月）。

林瓊華，〈戰後紅色祖國的「台灣民族」變奏曲——以古瑞雲先生的回憶錄手稿（1947-1976）為析例〉，《「殖民·再殖民·獨立自主」台灣歷史學會創刊二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歷史學會，2016年）。

林瓊華，〈背叛與沉冤的辯證：關於謝雪紅離開二七部隊的歷史問題〉，楊翠主編，《青春二二八》（台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17年）。

林瓊華，〈戰後台灣左翼者進入中國前夕的政治理想與失落——以創刊香港的《新台灣叢刊》為析例〉，《三代台灣人：百年追求的現實與理想》（台北：遠足文化，2017年）。

林瓊華，〈一個台灣殖民地左翼女性經歷的父權政治重圍：謝雪紅與她的男性同志及政敵（1928-1970）〉，《台灣史學雜誌》第23期「張炎憲老師逝世三週年紀念專號」（2017年12月）。

#### 報刊、影視資料：

陳芳明主講，「民視台灣學堂」：《台灣事件簿：謝雪紅傳奇一生台灣第一位女革命者》（2017年6月15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ctFGVjwGLo&feature=youtu.be>

陳芳明主講，〈台灣政治運動史：謝雪紅領導二七部隊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2018年4月26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LtXqymvM>

台中市新文化協會製作，李佳懷導演，《武裝台中》紀錄片（2018年）。

羅苑韶，〈二二八武裝反抗二七部隊歷史圖像重現〉，中央通訊社（2018年1月20日）。<http://www.cna.com.tw/news/acul/201801200150-1.aspx>

